

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 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分析⁽¹⁾

畢恆達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住宅可能是個人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空間。它提供個人安全感和控制感，反映個人的價值觀，並給予人連續性與永恆感。家在人們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幾乎沒有人質疑，而視為理所當然。反而在家遭受干擾或破壞的時候，我們才會重新思索家存在的必然性與其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企圖以民生別墅住宅輻射鋼筋事件與林肯大郡房屋倒塌事件來說明住宅環境災害如何引發個人自我認同危機、翻轉家的概念、並改變了家庭關係。

關鍵詞：環境災害、家的意義、地點黏結、自我認同、不確定性

九二一地震發生之後，許多社會學家突然發現雖然台灣過去也是災害頻傳，但是社會學界幾乎沒有對災害付出學術上的關心。社會學家對於地震這個造成台灣社會如此巨大傷害的現象竟然沒有直接的用處，因而感到汗顏，並開始反省：「我們到底能對社會做些甚麼？」（王振寰，1999：8）回顧台灣過去有關環境災害的經驗研究，大都著重在工程面向（如建築防火材料、氣象防災、地震工程、水災防護等）；而防災的社會經濟層面，則著重在災害的危險度評估、災害預警系統、防災效益評估、救災支援系統等，鮮有對災害發生之後，受災居民之認知與其生活所受之影響加以研究（畢恆達、郭一勤，1999）。另一方面台灣有關家庭的經驗研究關心的則是婚姻與親子關係、家庭決策、婚姻暴力等議題，大部分研究都沒有處理住宅空間的使用與意義（畢恆達，1996）。本文即企圖連結環境災害與家的研究，從環境變遷的觀點來看家的意義之轉變。

住宅與家的意義

家 (home) 可能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地方；它可能幫助人的成長，也可能威脅人的基本生存。住宅或房屋 (house) 不一定是家；住宅是一個實質空間 (physical space)，但是家包含了我們賦予空間的心理、社會與文化意義。我們可以用錢買一幢住宅，但是無法買到一個家；家需要我們持續的維護、經營與投入。而我們稱為家或家園的地方，可能是一個房間、一幢住宅，也可能是一個小公園、城市、或國家。當然過度強調住宅與家的區別也有問題，當我們說「台北不是我的家」、「走訪美國，朋友的款待讓我有回家的感覺」的時候，家可能只是一個比喻而已。我們需要花心思探討的是住宅如何成為家，而「無家可歸」(homelessness) 不是簡單的房屋匱乏的問題，即使擁有住宅仍然可能缺少對此地點的情感連結。有關家的社會心理意義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取向，分別是心理分析與社會表徵。

心理分析

非人類環境 (nonhuman environment) 並不是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主要興趣。對於佛洛伊德而言，人的生活是被社會與人際環境所引導與形塑，物只是性心理的需求與衝突的外在表現。它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物的內在性質被化約成人或身體的一部份。

Marc (1977) 指出嬰兒在母親的子宮裡太舒服了，以至於他不想離開它，並且在出生之後就努力想再回到子宮裡，因此他蓋房子。房子的形式已經藏在人的內在。與其他世界隔離的非洲人，仍保有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兒童所畫的房子就傳達出他們內在的聲音。當兒童畫房子的時候，他並沒有參考外界的模型。那個房子大致上是對稱的、輪廓並不清楚、基礎差不多是圓形的，其實它就是子宮。當人們建造一間房子時，他就是在創造一個和平、平靜和安全的領域，它是母親子宮的複製。從那裡我們離開世界去傾聽我們內在的韻律，並且創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免於危險的安全地方。當我們跨過房子的門檻，把門從我們後面關上時，我們就可以和自己成為一體。

Cooper (1974) 採用容格 (Jung) 的理論架構以解釋住宅的象徵作用，即普遍的集體潛意識聯結人們及其原初狀態，而原型一心理能量的節點一必須藉著象徵向外表現。Cooper 指出住宅是自我的基本象徵。她引用社會科學文

獻、文學、詩與夢的分析，以說明居室反映了人們如何正視自己為一個獨立個人以及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Cooper 視家為心理的延伸，經由和物質世界的親密關係，使得人格能夠成熟地成長。

但是如果住宅裡住的是房客、沒有關係的人群、僕人或定期來訪的客人，那又如何？它是誰的自我象徵？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建造房子。房屋做為一種商品，而且可能已經由陌生人住過幾年，如何能傳達此種象徵？(Saegert, 1985)此外，住宅不只象徵自我為一獨特的人，也象徵團體認同(Pratt, 1982)。而 Cooper 有關獨立住宅做為一普遍、不變的象徵形式的論證則只是靜態的描述，忽略了地產商與政府政策在形塑獨立住宅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表徵

Chapin (1935) 嘗試利用四個尺度以決定人們的社經地位：文化設備、有效收入、物質資產以及社區活動的參與。他發現只要知道客廳裡的設備與東西就足以判斷一個人的社經地位。然此一分析只顯示客廳的東西與其他指標的相關度，但是以之做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則落入了定義的循環(Baudrillard, 1981)。

假設客廳反應了人們社會認同的表現，許多研究者(如 Amaturi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 Bonnes, Giuiliani, Amoni & Bernard, 1987; Duncan & Duncan, 1976; Laumann & House, 1970; Pratt, 1982; Weisner & Weibel, 1981)沿用 Veblen(1899)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以及 Goffman (1959)的「前台」(front region)的概念，以研究客廳陳設與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們除了關心社經地位的指標，也探討居民的社會與政治態度(Laumann & House, 1970)；他們不只調查居民客廳陳設的清單，也探討其式樣(Laumann & House, 1970)、佈置方式與維護(Amaturi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考慮權力結構的社會過程，因此無論其實證之統計關係如何的精密，都無法給予我們一幅階層社會的圖像(Baudrillard, 1981)。

Duncan 與 Duncan (1976) 探討不同性質的社會地位以及表達社會地位的不同管道與方式。他們比較美國波士頓與印度二地區的傳統與新興社會菁英的家庭消費模式，並且利用社會網絡的可穿透性(impermeability)以解釋此二團體的差別。傳統菁英將錢花在社交活動以表達其社會身份。他們有一個

極為緊密的社會網絡，因此可以依賴口語以維持其聲譽。但是新興菁英處於較鬆散的社會網絡，因此需要較持久可見的證據，例如住宅與裝潢，以重複地向不同的觀眾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不致耗盡其資源。

這些研究代表了社會科學裡的一支傳統，認為在現代消費社會裡，表現社會地位是住宅與物的主要意義。然而 McCracken (1987) 發現許多現代北美的中產家庭，利用物以營造家的感覺 (homeyness)，做為對抗地位競爭的堡壘。這個居家環境給予人們凝聚與滿足感，並使人們遠離對於權勢的永無止境的追求。

Despres (1992) 曾歸納許多經驗研究中居民提出的家的意義。她指出家的意義包括：(1) 家提供安全感與控制；(2) 家是個人理想與價值的反映；(3) 家是形塑個人的居住環境；(4) 家提供永恆感與連續性；(5) 家是與親友交流的場所；(6) 家是活動的中心；(7) 家是外在世界的避風港；(8) 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9) 家是一個實質空間；(10) 家是一種擁有權。

面對住宅環境的改變，家的意義又會有怎樣的變化呢？本文將分別以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二個個案來探討。其中民生別墅的案例，為在住宅中發現輻射鋼筋，亦即家中就有污染源，導致許多居民或搬遷或調整居住空間繼續住在一個具有威脅的環境裡。林肯大郡因山坡地的不當開發，在颱風來襲時，發生部分住屋倒塌，造成 28 人死亡的慘劇。同樣的，居民或搬遷或者繼續住在一個有潛在危險的環境裡。以下分別簡單介紹這二個個案的背景與歷史。

研究田野：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

1992 年 7 月底，一位住在台電廈門街宿舍的台電員工因為攜帶輻射偵測器回家給小孩玩，卻赫然發現家中樑柱就含有異常輻射。幾天後，原子能委員會 (原委會) 收到指證的信函，前往偵測，證實該建築確實受到輻射建材污染。同年 8 月 15 日，自由時報率先報導了民生別墅受到輻射污染的消息。經住戶要求，數天後原委會派員至民生別墅進行全面的檢測。測量結果初步證實 70 住戶中有 34 戶遭到輻射污染。污染主要集中在電梯間和 2 至 5 樓的樓層，偵測所得的最高輻射劑量為每年 6.7 侖目，核種為鈾 60。在輻射事件的調查與抗爭過程中，又揭露出過去不為人知的啓元牙科事件。原來早在 1984 年原委會就已經證實民生別墅遭到輻射污染。當時位於民生別墅的「啓元牙科」申請安裝 X 光機，卻始終無法通過檢測，負責發照的原委會既未告知當

事人真實原因，使用執照也遲遲未予核准。因為原委會派員檢測時發現，X光機尚未接上電源，即偵測出放射性物質的存在。原委會仍決定發予使用執照，同時要求該牙科需在牆壁四周加上鉛版，以降低輻射劑量。原委會只告知牙科負責人，X光室除工作人員及病人外，不宜有其他外人逗留，卻未說明原因（引自佐藤妮娜，1993：83）。

1997年8月18日早上，溫妮颱風來襲，位於沙頁岩互層、順向坡、且建築物未與山坡保持安全距離的林肯大郡發生擋土牆崩裂，造成第三區第一排房屋之柱子斷裂，其一、二樓被壓平，而整排大樓則傾斜靠在後面的一排樓房上。總計70戶房屋全毀，20餘戶半毀。受災住戶，部分接受短期房租補助、部分由建商安置在社區內其他區的七、八樓區與十五樓區的空屋內。發生房屋倒塌的區域主要為社區中的第三區第一、二排與第二區的尾端。第三區第三排的住戶，由於緊鄰倒塌的房屋，當時即被列為疏散區。第四區雖然被劃為警示區，但是居民發現地下建物原設計只有二層卻興建成四層，而且是座落在十餘公尺的回填土上，且位於下水位，因此居民認為和第三區同樣屬於危險的居住環境。

環境災害所造成的衝擊是整體、全面的，包括個人、家庭、社區、政府、企業等不同層級認知、關係的改變。本文並不打算處理造成災變背後的法令制度或執行的問題，也不探討受災居民與媒體、政府關係的衝突與互動，而將焦點放在家的層次。住宅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所以本文要分析的是：當住宅遭到破壞的時候，原來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而未在意識中反省的家的意義會有怎樣的改變？

1993年1月，作者以研究者的身份，進入民生別墅，並參與居民在地下室舉行的住戶大會。透過住戶代表所提供的資料，我們掌握了大部份住戶的地址及聯絡電話。經事先電話聯絡詢問其接受訪談的意願，或隨機直接登門拜訪名單以外的住戶，然後進行訪談。在1993年1月到4月期間進行第一階段訪談。為了解政府處理輻射污染事件的過程，以及居民社會關係與心理反應的歷程，我們在一年後，亦即1994年2月到5月之間對居民進行第二次訪談。總共針對34位受訪者，進行40人次的訪談。居民的部份，第一階段訪談了23位居民：17位女性，6位男性；其中9位是重污染戶⁽²⁾（年劑量超過1.5侖目），5位中度污染戶（年劑量介於0.5至1.5侖目）；房屋所有者有17位，承租戶有6位。第二階段則有6位住戶接受訪談，其中女性3位，男性3位；3位是重污染戶，1位中污染戶，且均是房屋的所有者。此外，分

別有 4 位環保團體義工、2 位原委會官員及 1 名記者接受訪談（畢恆達、郭一勤，1999）。

1997 年 9 月底，亦即林肯災變發生過後一個月左右，我和研究生首次進入社區。在公共空間中與社區居民攀談，進而認識了幾位住戶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和熱心社區事物的居民。當時我在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開授災害心理學課程，和修課學生討論過後，決定以林肯大郡作為研究的田野。林肯大郡依據建商規劃分為五區，所以 10 個修課學生分成 5 組，分別和一個區的居民聯絡。在和社區居民討論災後各種求償問題時，發現社區有很多居民已經遷出社區之外，即使留在社區中的居民也常覺得缺乏社區相關訊息，不知道求償的進度如何？政府或建商有甚麼承諾或行動？於是學生以其他社區運動的經驗為借鏡，建議林肯社區辦社區報，作為聯繫社區居民的網絡。五組學生就分別負責和居民聯繫，在當學期辦了五期社區報，然後移交給社區居民。當時除了日常的聯繫之外，每區則分別訪談 2 至 5 戶有關於災變本身以及災後的影響與行動等問題。1998 年 8 月，國科會核准關於林肯大郡的研究計畫，此後，我和研究助理就更密集參與社區的事物，包括社區會議、街頭抗爭、立法院公聽會等。在這一年的參與觀察過程中，除了正式會議與資料蒐集之外，也進行很多的非正式訪談與觀察。

研究發現與討論

自我認同的危機

一個人的自我（self）就最廣義的界定來說，是他所有可以稱為他的（his/her）的總和，不只是他的身體和精神，也包括他的衣服和房屋。這些東西給他相同的情感。如果它們不斷滋長，他會洋洋得意；如果逐漸衰退，他會感到沮喪（James，1890：291）。在人們所擁有的物品當中，房屋可能是就經濟價值而言最昂貴的一件，許多人奮鬥一生為的是要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屋。當然房屋並不只是一個可以讓人擁有、或是提供遮風避雨的地方，它更可能由於人常處其間、完成重要的個人、家庭與社區的活動，進而讓人發展出心理上的黏結（attachment）（Brown & Perkins，1992）。這種對家的黏結整合了人的自我界定與認同，而黏結的破壞就可能危及個人的自我界定。房屋以及其他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傳達了「我是誰？」的訊息。房屋遭到破壞，

例如遭到污染、倒塌，個人的價值也受到影響。

Korosec-Serfaty 與 Bollit (1986) 在一個有關遭小偷經驗的研究中指出，被偷竊的事實顯示不只是財產受害，財產所有人也受害，而父母在兒女眼中成爲一個受害者。受害者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質疑自我掌控生活事件的能力、進而影響自我認同。自我評價的降低讓受害者有罪惡感。住宅原來是父母角色展現的主要場所，偷竊尤其讓人對自己做爲父母的權威感到懷疑。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居民所遭受的住屋威脅遠比遭小偷嚴重的多，同樣的，個人的價值認同也會遭到質疑。最常見的是爲自身沒有辦法給小孩子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而自責。「我們作父母的就覺得非常的內疚，把小孩置身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造成他們一輩子的遺憾。」有一位住在埔里的九二一震災受害者則說，她一直是一個很能夠掌控自己生活的人，但是地震所造成的傷害與後果卻完全在她的控制之外。她住在一幢大廈裡，房子是否需要重建、貸款能否緩繳或由銀行政府概括承受都無法由她自己決定。「事實上，我住過很多的城市，可是現在我被 trap 住了，沒有辦法 calculate，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的生活。」一位林肯大郡的受訪者則說：「窮人有時候你是沒有辦法選擇的，你只能被迫接受。...我也想離開，可是我沒辦法離開。」於是只好承受心理壓力，繼續住在一個令她膽顫心驚的環境裡面。

林肯大郡的居民大都是 30 到 40 歲的中產階級居民，他們辛苦打拚，不想寄人籬下，不想搬來搬去，爲了尋求生活的安定，找到這個在經濟上可以負擔得起的住屋，也算完成人生計畫中的一件大事。但是溫妮颱風摧毀了他們辛苦織起的美夢。這不只是經濟的巨大損失而已，更危及生活的價值。他們根本質疑辛苦工作的意義何在？過去工作爲的是找尋一個安定的家，現在工作的薪水卻要拿去繳交一間已經無法居住的房子的貸款，而且「人有幾個十幾年、二十年。」「我覺得現在生活倒沒有甚麼問題，是對未來的那種絕望。」擁有一幢自有住宅本來是絕大多數居民奮鬥的夢想，但是因爲災變，使得「林肯大郡就像是監獄一樣，賣也賣不掉、租也不敢租。甩都甩不掉。就像是一個枷鎖一樣。」尤其是又經過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更多的房屋倒塌，使得擁有房屋變成一種負債，除了災後生活的困頓之外，還要爲尚未繳完的房屋貸款而煩惱。有些居民就說他以後再也不敢買房子了，寧可用租的，也不願再背負十幾二十年的房屋貸款，又要懼怕會不會有另一次災變發生的可能。「活著就有希望，這次就是給妳一個借鏡，就是不要買房子。...我要逐水草而居，真的這樣。我房子倒了，又發生地震這樣的事情，妳說妳會買第二個家嗎，

不會吧。」

在受訪者過去的生活世界之中，住屋的擁有權提供了建構家的可能，不再需要寄人籬下、不再需要短期搬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住宅、並且給家庭成員穩定感，成為籌畫未來的基地。但是突來的環境災害，不僅破壞了住宅空間本身，也讓有些人追求自有住宅的神話破滅。一位輻射屋的居民說：「我一看到那根柱子，就知道這是輻射鋼筋，它不必寫字。...我坐在這邊看電視，心裡想到這根柱子...想到我老婆...覺得好恨，好想把那根柱子敲掉。」美國一個地下水污染社區的住戶，就經常在星期假日外出，以免在家望水興嘆，徒增焦慮。他們甚至幻想當他們回家的時候，最好房子已經被火燒掉了 (Edelstein, 1988)。一位住在埔里的朋友因為原來居住的大樓究竟能不能整修還是要拆除重建一直懸而未決，因而無法規劃自己的生活，她覺得「有的時候希望房子乾脆倒了算了」。這些實例顯示人與住宅之間原有的地點黏結隨著災害而失去，並且轉化成為一種人與住宅疏離的關係。

再者，辛苦工作的意義也跟著失落；過去工作許諾了擁有自宅的未來，現在工作所得卻拿去支付已經無法居住房屋的貸款。擁有自宅的成就感、工作帶來的自我實現，都隨著環境災害而失去。災害之後，支撐自我的力量，則來自於家庭成員的相互扶持、持續抗爭為最後的正義而戰、更加努力開創事業第二春、或計畫移民將負債情境轉化成為從零開始。

輻射、颱風、地震所造成的災害影響了一幢大樓、一個社區，甚至一個大的地理區域，外人對於受害者只有一個模糊的集體印象，然而實際上每個受害者都因為受害程度、家庭背景、個人歷史等不同，而有不同的受災經驗。災民這個統稱，讓獨一的受害者的個人獨特性不見。「一樣是災民，可是我要有自己的 identity。」「individuality 不見了，親朋好友只是一個大略的印象，沒有辦法把你當成一個獨特的個體來看待，去瞭解你的特殊經驗。」住宅的污染與不確定性，導致人與住宅的疏離；此時集體的受災，又造成人與其他沒有受災親友之間的疏離。「有的時候好像說自己的經驗沒有得到合法性，因為一定有人比你還悲慘。」於是在一個集體災難當中，有些單一受害者覺得受災的經驗說也不是，說了好像在比慘，然而不說又也不是，因為期待親友的理解。這種有話說不出的窘境，影響了一個人的性情。「大家在比嚴重，以前我不是這樣小心眼的人。」然後在抗爭的過程當中，念及受難的親友鄰居、目前艱難的處境，發言免不了充滿情緒。此時，社會大眾或官員又會責怪他們太過情緒化、缺少理性。加上受害者的訴求通常沒有得到建商或政府的正面實質回應，導致他們

必須一而再、再而三的把相同的訴求不停的講述。沒有回應，讓人說話的情緒也必然跟著高漲。許多人都是在成為受災者，而又得不到社會公義的時候，才能夠理解過去在媒體上看到的社區抗爭者走上街頭的心理處境。「以前我都會覺得說：嗯！那些人怎麼這麼無聊，又在搞街頭運動，又在抗爭。真的我會覺得說怎麼這麼無聊，大家好好的日子不過，可是臨到自己身上那種無奈，你才能夠有深刻的體會，不是無的放矢，是那種真的無奈的上街頭。」

我不是「災民」

突如其來的環境災害，其發生與造成的後果往往無法為受害者所控制，但是他們通常不願意被當成是「災民」。

「我最怕人家說：『林肯大郡好可憐哦！』我最怕聽到『可憐』這兩個字，我說我好好的啊，不需要人家可憐啊！...我奉公守法，然後以前我從不覺得我比人家低啊，可是自從林肯大郡之後，我就覺得奇怪，我怎變成一個可憐的人？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我怎麼一夕之間變成這樣子，那種心情那種感覺非常非常懊惱，也很生氣。」

「我自己成為...被別人同情的對象，心裡就覺得不舒服。」

也就是說，他們即使無法控制災害、決定處理的方式，也極需要社會及媒體的關注，但是他們不需要憐憫。因為他們只希望得到合理正義的對待，討回他們應該得到的，而不是別人的施捨。所以即使是別人眼中的「災民」，並不等同於失去做人的尊嚴。一位暨南大學的老師，在九二一震災後，住宅被判為半倒，研究室也毀損嚴重，她說：「我記得我整理（研究室）的時候，垃圾還把它分類。學生說：你收的最乾淨。我好像即使當災民都要當第一等災民，期望保留一點 dignity（尊嚴）。」就像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在災變發生後不久，夜晚都穿著西裝睡覺，他說即使死了，也要死的漂亮。災害剝奪了人控制生命的能力，對他而言，唯一能做的是控制死亡的形象。

災後友好意的關心可能反而讓居民無法從生活的壓力中逃脫；有的居民希望將工作和家庭的世界做一個截然的區隔，藉由工作忘卻住宅災害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但是同事朋友的詢問，讓他們無法擺脫。「九二一地震，我有三百多個客戶，光一百個跟你問候就好了，啊你們林肯大郡有沒有怎麼樣，

妳看妳怎麼回答。」同樣地，他們希望獲得關心，但不是隨口問問那種，而是瞭解內情的關心，或是有意義、有建設性的關心。有的人只是經由媒體片面的報導，因而無法真正瞭解他們的真實處境。「坐計程車，到哪裡？到林肯大郡，啊怎麼樣了。他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一件事情怎麼可能拖那麼久還沒有解決。」很多的居民會因為社會大眾或是親友的誤解而感到生氣。尤其是被媒體報導成貪得無厭的暴民，或是明明事情沒有解決，別人卻以為他們已經得到很多的好處。

「每個人都會來問，可能是基於關心吧，可是那種關心對我來說是一種非常不舒服的...」

「親戚朋友的關心，後來都變成是一種負擔。」

「因為報紙上有一些消息，讓他們覺得林肯大郡解決了，那他們的確是關心，所以他們都會跟我說：『聽說林肯大郡解決了』。我討厭就是明明沒有解決我還要跟你解釋那麼多...不知道的是說：『那你們現在林肯大郡怎樣了？』...不了解的人你要講到他明白要講一堆，其實他可能只是一個關心，只是一個問候語，因為我是林肯大郡的住戶，可是又不知該怎麼去回答他，又不失禮貌又不會讓我很煩，我覺得這實在很麻煩。」

自我認同的形成牽涉了一個「我們自己想像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過程。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居民不只可能遭受異樣的眼光，也可能面對正面的質疑或是「譴責受害者」的社會壓力。親友可能質問甚或嘲笑：「那種厝你也去買！」面臨這種挑戰，居民必須提出一套解釋來肯定自我。「事情發生之後當然有人放馬後砲。」「有的人說是我們沒有知識。（可是）人家那個建設公司的總經理還買三間，還有保險經紀人、律師、立委也都有人在這邊買的啊！」有的林肯大郡的住戶就養成了說「我很笨！」的口頭禪，做為自我解嘲的發洩方式。其實他們很清楚知道，「我們沒有錯，如果有，那是錯在我們太相信政府、相信建商。」一般民眾也許也不懂得甚麼是順向坡或沙頁岩互層，但是他們仍然可能以山坡地的外觀、建築物與擋土牆的距離為由來顯現自己的先見之明；然而鋼筋中的輻射完全無法由人們的感官察覺，十幾年前社會對於輻射鋼筋也完全沒有認識，不過輻射鋼筋曝光之後，民生別墅居民的親友仍然對其當初購屋之決定進行質疑。一位住戶當初和他的哥哥同

時買房子，她住進民生別墅，她哥哥則住到別的地方，事件發生之後，她哥哥責怪她說：「當初要你們在我這裡買房子，妳就不要，偏偏要買那裡（民生別墅）。現在，妳看吧！」偶發的災害帶來身心與財產巨大的損失，受害者與其身邊的人開始回溯當初購屋的決策過程，尋求受害的歸因。夫妻之間如果爲了此事相互責怪對方，在面臨環境壓力的情形下，不但於事無補，更可能危及其間的關係。林肯大郡的居民，有的人不但自己買了房子，還介紹親友同事搬來一起住。不論房屋是否倒塌，都有一股難以去除的罪惡感。而社會大眾，既然無法，可能也不願爲受害者做甚麼事，於是譴責受害者，爲自己的不介入找到合理的藉口。

除了追究購屋決定的責任之外，究竟要不要犧牲工作與家庭的時間，積極地參與社區的抗爭活動，也常成爲夫妻關係衝突的焦點。處在環境災害所帶來的強大生活與心理壓力之下，如果夫妻之間對於應付災害的方式沒有共識的話，經常導致關係的惡化。例如家庭成員間，有的認爲應該「積極加入災戶組織工作，希望付出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公義的回應」，有的卻認爲「升斗小民難以與強大的政府對抗，唯有盡快趁著年輕多賺一點錢，再買第二幢房子才是應該做的方向」。有的想「搬回去住」，有的卻認爲「搬回去住正好給政府對外說沒有危險的藉口，就更不容易要政府來處理災後的爛攤子」。如果沒有良性的溝通，尋求相互的理解並形成共識，嚴重的時候可能就導致家庭關係的破裂。幾個參與社區抗爭的女性，談到她們如何與先生共同處理抗爭與家庭之間衝突。

「我先生這個時候他就蠻包容的，他就是把孩子照顧好，然後讓我可以沒有顧慮的去衝林肯大郡的事。」

「交代一下他就會配合幫忙煮飯給小孩子吃或怎樣，基本上他等於是說在幕後支持妳。」

「（我們家）還有三個小孩嗷嗷待哺嘛！那經濟中斷也不是辦法，我就跟他講說，我們分頭來進行。...我們家只要一個人出來弄（參與抗爭）就好了。」

然而參與抗爭，由於訴求往往沒有得到回饋，難免會把情緒帶回家庭，此時先生的支持就很重要。



「他每次都聽我滿心的期待講了一些接下來（社區）可以解決的話，他一直都不忍去刺破我，我的哪種希望。」

「我覺得我應該已經失去控制，不是理智，所以我對所有事情都非常堅持。我先生這個時候就蠻包容的...我有察覺到我先生情緒上的一些變化，那他知道我承擔這種林肯大郡的壓力已經很大了，所以他沒有再把他這種情緒表達給我。」

住宅本身以及其內的客廳裝潢等，經常是人傳達其社會地位的象徵（如 Duncan & Duncan, 1976）。輻射及山坡地的災害卻讓住屋成爲一種污名。過去林肯大郡的居民在社區裡辦活動的時候，還告訴小孩說：「你們是林肯的小孩！」語中傳達了對於社區的認同。現在他們只說住在汐萬路，而迴避林肯大郡的標籤。「我會覺得很丟臉。我去郵局辦定存，我去寫扣繳憑單，汐萬路，人家就問，那你是汐萬路哪裡啊，喔，我就說我們就是林肯大郡，然後大家就都在看你。」「現在搭計程車也不敢說住林肯大郡，人家都會以異樣的眼光看你。」

曾有一位記者到民生別墅採訪，發現有住戶因爲臥房有輻射鋼筋而全家住在客廳裡，只見客廳裡擺滿了床，記者就直接質問父母爲什麼不搬家，忍心讓小孩子繼續暴露在輻射的污染之中。從此以後，那戶人家當有人按門鈴的時候，只會把門開一個小縫，除非必要，否則不會讓人進入住宅之中。留在林肯大郡的居民有時也會受到親友好意詢問的壓力。「有時候他們好心說一些話，像是很危險為何要再住，難道不顧小孩...等一些話，但是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困難，是啦，他們也是好意，可是有時候卻也會造成我們的一些負擔，有時反而很痛苦。」在抗爭求償的階段，有些林肯大郡的住戶，因爲懼怕住屋發生危險，因而搬出社區在外租房子，由於有經濟壓力，可能租一個坪數較小的房子；又由於可能會搬來搬去，有些大家俱就仍然留在林肯大郡的住宅裡。狹窄的房子、簡陋的家俱，常使得他們不再歡迎親友的來訪。但是有些人住的寬敞、房屋整理得很好，也會受到另一種質疑。「她們把我當災民，認爲我應該要刻苦一點，可是我爲甚麼不能有好的生活呢？」朋友覺得他們生活狀況這麼好，那還抗爭做甚麼？就像有的人當初可能買了兩幢房子，於是別人就認定他是有錢人，不應該抗爭，但是沒有想到他以前比較有錢沒錯，現在卻可能正因爲如此而負債更多。而且對住戶而言，抗爭要求賠償只是追求正義而已，跟有錢沒錢沒有必然的關係。

除了前述社區的污名之外，民生別墅的居民還要承受輻射對人體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因此而遭致的排擠。有些民眾以為居民長期住在輻射屋裡面，人也會變成輻射人（源）。「因為他們（同事）不瞭解，所以壓力也蠻大的。像我們同事，譬如說我一進電梯，他就說『你離我遠一點，你的身上有輻射』。」「我覺得住在這裡的人夠倒楣，然後大家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裡面的人好像是患多氯聯苯的人一樣。」

有的民眾由於沒有足夠的輻射知識，甚至認為民生別墅裡的家俱也可能成為輻射源。社區附近的房主就曾經拒絕將空屋租給民生別墅的住戶，深怕住戶的家俱或身體污染了他們的房子。一位民生別墅的太太的經驗是：

「以前我家裡重新裝潢的時候，把舊的家俱送給我的親戚，他當時很高興的接受了。但是在報紙登了輻射的新聞以後，我就在附近的垃圾堆發現了那套家俱。我心裡想，我是不是也不要到他家裡了，因為家具有（輻射），他是不是認為我也有？」

由於輻射對身體的傷害有很長的潛伏期，也可能造成基因突變，因此有的住戶盡量不說、不讓別人知道他們曾經住過民生別墅，以免將來小孩找不到結婚的對象。對這些住戶而言，不但必須遠離熟識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關係，還得刻意與自己的生活歷史切斷，形成生命中在空間與時間上的斷裂。住宅經由居住者長時間一點一滴的經營而成為具有認同感的家，它承載了居住者個人與共同的生命軌跡，即使是遷移，人們都經常藉由攜帶具有意義的物品來維繫個人與社會的歷史性（畢恆達，1990），然而上述災變的受害者不但實質上離開居住已久的住宅，還要在心理上與家的歷史割裂。

家的意義的倒轉

我們常說家是安全的堡壘、家是避風港、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家是親人聚在一起互相傾吐痛苦與歡笑的地方、家是擺脫工作環境壓力使精神得以鬆弛休息的地方、家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的終點（如 Appleyard, 1979；Despres, 1992）。對許多人而言，辛苦工作十年二十年為的就是購買一幢屬於自己的住宅，然後才能夠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在我們搬去林肯大郡的時候，付出了很多心血去佈置營造這個家，因為這是我們生平第一次這樣

去用心經營自己，佈置一個感覺上最舒適的一個家。」民生別墅的居民也形容其所住的房子是一個「全家人生活、尋求避難，回來就什麼都不管，一個很舒服的地方。」「這個家就是讓你白天工作所受到的挫折、歡喜，在晚上吃飯大家團聚的時候一起來分享。」「家好像是一個堡壘，靠男人來固守，別人不容、不能侵犯的一個堡壘。」

然而對於民生別墅的居民而言，由於輻射的介入，這些家的意義已經逐一失去。住宅空間內的輻射污染使得家由原本的「避難所」、保衛家人生活與安全的地方，變成是家人要為之抵抗、保護的對象（Brown & Perkins, 1992）。林肯大郡的居民也表示：「我昨天還做惡夢，夢見我家的窗戶掉下來，我用手扶著窗戶。」一個原本日常最親密的生活空間，變成一個讓居民想要逃避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地方。回家不再是期待。家變成是一個想逃離的地方。出去不再有目的，只是為了要出去。

Bachelard（1969）曾經用森林裡的小屋作為家的原型，即使狂風暴雨來臨，小屋也跟著顫抖，但是屋裡的人知道在屋裡他就是安全的。遮風避雨本來是住屋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對於林肯大郡或是民生別墅的部分居民而言卻連這個功能也受到威脅。颱風來了，政府或親友可能會告訴你最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因為外面很危險，而家裡是安全的。但是林肯大郡的居民在颱風來臨前卻要趕快「跑到人家家裡逃難」。我們常說家是避風港，這裡指的不只是家提供了物理環境的安全，它也是外在險惡的社會環境中一個安全的堡壘，一個可以與親人共享感情的場所。林肯大郡的居民則覺得無法自外於危險的情境。一位居民從外面回家，她表示她是：「剛從北投坐計程車回來，從陳進興的懷抱逃到林肯大郡的懷抱。」由於鑑定報告無法給居民確定安全的訊息，加上居民從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觀察（例如日益擴大的牆壁裂縫、雨後地面不斷湧出的水），導致家不但無法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危險的來源。

「我每天晚上都做惡夢，夢到從懸崖摔下去。」

「發生事情後的兩個禮拜內，我們都是穿好衣服睡覺，隨時準備逃難。」

「我覺得怕怕的，房子前面就是擋土牆，睡覺時看到天花板上的裂痕，我和我兒子說：我們去睡床底下，他說：『媽，你神經病，床上不睡要睡床底下。』其實我怕的是，颱風來了可以事先知道，

那地震呢？常常睡到一半都會作夢，夢到嚇醒，有時還會尖叫。」

「看到地下室的大樑裂開，以及當初都不曉得地下停車場下面還有一層，現在每天作夢都還會害怕。小孩的情緒也不穩定，有許多東西都是擺在車上，誰知道哪時又會發生什麼事，隨時開車就可以走了。」

「在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都很怕鬼，很怕黑對不對？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我膽子很小，我要進廁所的時候我都用衝的，衝進去衝出來，因為害怕，半夜起來上（廁所）都用衝的，這種感覺一直到我林肯大郡發生之後，再次有那種感覺出來，尤其是在剛災變的時候，包括要開那個門要進去的時候，我都有那種感受，進去趕快出來，就深怕下一秒鐘它就垮了，那種感覺，就是立即它就垮了，就那種用跑的那種感覺。」

家不再是一個安全而溫暖的地方，而是一個你想逃離的空間。因為「你出去就感覺很好，你一回來感覺就壓力很重。」「以前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我都和孩子說，沒事不要在外面晃，回家最安全。現在家變成最危險的地方。」一位民生別墅的住戶則形容：「以前出去玩，是為了出去『玩』；現在出去玩，是為了『出去』」。家裡有輻射污染，卻沒有經濟能力搬出去的住戶說：

「我常常掏私房錢去洗三溫暖，就是不要待在家裡，我寧願花錢也要保護我的命啊！」

「這個家原來是很溫暖而且安定，回到家就覺得心裡很踏實、穩定。可是自從這件事之後，我知道這是我的家，我卻不敢回來，可是我不回來又不行啊！我沒有地方可以去啊！但是現在這像個家嗎？這種感覺很痛苦啊！」

「以前每天下班的時候總是期待趕快回到溫暖的家，與太太共進燭光晚餐。後來家裡發現輻射鋼筋，心想回去幹嘛。兩人就在外面晃。但是在外面晃久了也不是辦法，還是要回家面對現實。」

過去家是人們在外工作、就學、遊玩之後，期待歸去與家人團聚的地方。但是發生災害之後，住宅空間成為危險的來源，於是大人寧願放棄與小孩團聚的溫暖，反而鼓勵小孩子在外逗留。

「小孩子還好，但現在我都叫他們沒事不要回家，在家裡最不安全了。但小孩子會說：那外面有陳進興怎麼辦？外面也不安全。我告訴他們，陳進興只有一個，外面人那麼多，比較不會輪到你，但家裡就都裂了，就比較危險。」

「現在他們放學喔，我都叫他們留在學校唸書，不然就去同學家。我那個大兒子愛打電動，以前我都怕他不回家，在外面會變壞，現在寧願他學壞也不要他壓死，對不對？」

住宅空間的災害也導致家庭成員的分離或重組。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說，她和她先生現在「過著牛郎織女的日子」。她先生因為上班的關係留在林肯大郡居住，也同時可以看著房子，以免遭小偷或是有流浪漢住進來。她自己則為了孩子的安全搬到外面居住。

家本來是款待客人的地方，但是發生災變之後，因為住宅的危險，他們不再歡迎親友的來訪。一位住在民生別墅的先生以前經常在家裡舉行朋友間的聚會，這是他們朋友間頗為融入的生活模式，對他而言，朋友間的聚會是生活中重要的過程。「我這一生中，給我最大的啟示，一個是家，一個是朋友。...我這裡是朋友的聚會中心，我太太煮的東西也很好吃，這已經成為他們的習慣。」但是因為家裡發現了輻射，這樣的生活模式也必須隨之改變。「朋友有來，我都跟他們講我這裡有輻射鋼筋，敢來的再來，不敢來的就不要來。」「有時候還帶他的兒子、女兒過來，我说不歡迎，你要過來，你過來就好，女兒不要帶來。」

而林肯大郡有一個住戶，在災變之後才剛嫁女兒，後來女婿跟女兒回門，丈母娘想說準備午餐大家吃一吃，結果突然打雷了，她和女兒馬上四目相對，很有默契的說：「好，那我們到外面吃飯好了。」那時丈母娘又不能表現的很緊張害怕，怕這樣會嚇到女婿，以後就不常回來，於是他們母女之間有一個共識就是說要是下雨天就不要回來，等到天氣好的時候再來。「那種感覺就是說本來是在家裡感覺很好很溫馨的聚會，就是因為一個雷雨，感覺統統不一樣，你就是必要到外面去吃飯。」

有的住戶則是在林肯大郡與親友家之間輪流居住。於是原來家所提供的穩定、連續性都難以維持；就連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都找不到定位。「東西丟三落四，我女兒的東西就分三地放，一旦忘了帶東西，都不知道東西在

哪裡？車上也有，娘家也有。」有一天她女兒上學途中發現國文課本忘了帶，但是沒有人知道課本放在哪一個「家」。

輻射鋼筋與山坡地災變同樣地都讓住宅成為危險的來源，但是它們對於住戶所造成的影響仍有不同。輻射對於人的傷害主要在於身體的病變；而住在輻射屋裡讓人繼續暴露在輻射的照射下，增加了病變的機率。不過輻射源（如民生別墅的鈾 60）有半衰期，其強度隨著時間而減低。居民經過檢測之後，大概可以得知住宅中不同位置輻射劑量的高低，因此利用更動使用空間與改變行為模式來減低受害的風險。例如有的全家人擠到一個唯一沒有污染的房間作息、有的把床搬到客廳來睡、將床與書桌搬離輻射源、把污染較嚴重的房間列為小孩子行動的「禁區」、小孩上廁所媽媽在外面讀秒、用小跑步的方式通過住宅中間具有輻射的走道、盡量待在外面少回家、真的沒有辦法可以逃脫就只好「面對現實，殘酷地坐在那邊讓它照」。此外，由於部分住戶的遷離，斷水斷電以及管理維護費用的短缺，造成「就看到這樣子，從四樓以下一片漆黑，幾乎都是黑的，沒有燈，沒有人住。」有的住戶甚至用「鬼城」、「沒人氣」來形容他們對社區的感覺。「還有那個不良少年來我們地下室吸食強力膠。」「看病回來我家門就（已經）被（小偷）撬開。」「房客要下樓...在電梯裡面差一點也是遭強暴。」一位高中女生因此不敢一個人留在家裡，晚上也不敢單獨上下樓，出入必須靠爸媽的接送。這種治安上的漏洞，使得家失去原來溫暖、安全的想像而變成是一個充滿危險的地帶。對家認識的改變，連帶地也影響住戶生活的節奏。此時，對許多住戶而言，家中的輻射污染對健康產生威脅，而社區又充滿對人身安全的威脅，於是居住環境不但無法提供保護，反而成為雙重危險的來源。居民因此在樓梯間與樓頂加裝鐵門、養狗、守望相助，來提高社區的安全感。

至於山坡地的災變，其危險性則不像輻射屋呈遞減的趨勢，而且風險難以預測。林肯大郡災變之後，經過專業技師的鑑定，發現除了順向坡頁岩、房屋距離擋土牆太近等問題之外，有些區域的地基為填方、且有不均勻沈陷的現象，因此有再一次發生災變的可能。颱風猶可預測，地震沒有預警，是居民最為害怕的情況。面對這種危險，仍然居住在林肯大郡的居民就各人發展出預測危險的方式。有的人每天晚上臨睡前都會針對牆壁的裂縫做檢視測量，看看是否有惡化的趨勢。有的人在家裡掛風鈴，用風鈴的聲音來測知地震的存在。一位住戶每逢下雨便會打電話至氣象局詢問雨量，或撐傘感覺雨量，因為他永遠記得災變當天雨水打在傘上的感覺。有的住戶則依賴具有土木專長又是社區組織幹

部的鄰居，以他的行動作為安全與否的指標。「...對對對，我每次回來都是看 X 先生窗口，他的窗有亮，我們回來有看見他的燈就覺得安心。是啊，尤其我們家就住 X 先生樓下，我都聽著他家的聲音，他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一跑，我就跟著跑。」

不確定性：時間與空間秩序

家不只是一個居住的空間，也提供我們時間上的認同。在家裡，一切東西與空間的安排都是非常熟悉的，日復一日的處身於這個環境之中，它變成是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Seamon (1979) 指出空間變成是一個植基於身體之中的前反思行動的場域 (field of pre-reflective actions)。即使是深夜裡沒有燈光，我們還是可以用身體去感覺環境，知道家俱所在的位置，在房間裡行走。每天晚上我們事情做到一半沒有完成，我們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之後，就可以繼續，不必一切從頭再來。離開家到一個陌生環境裡，我們要時時提高警覺、要去適應環境，可是在家裡我們可以放鬆、感到安全與連續性。家也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讓我們可以安排未來。它不只是個人自我認同的再現，也孕育了認同成長的環境。自我認同的成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自我意象的反映；它需要一個允許現在與未來、經驗與想像互動的可能。知道我們可以安居在一個地方而又有可能改變它，讓我們可以建立未來的夢想 (Dovey, 1985)。所以人與家的黏結也不是靜態的存在，它是一個過程；透過不斷發展的事件，我們維繫了與環境的關係。變換家俱的位置或者重新裝潢，改變了環境，但是仍然維持甚至可能加強了我們與家的黏結。如果人們無法改變環境來支持其所慾望的認同或目標，則這個黏結就可能消退。但是如果環境受到外界力量的衝擊或破壞，以致於居住者必須花費非常大的心力去維持其生命的連續與穩定，則個人的認同也可能受到傷害 (Brown & Perkins, 1992)。

家一方面需要長時間經營來建立個人與家的黏結，同時家也許諾了未來認同的發展空間。一個因為工作或其他外在因素而必須經常遷移的人，很難對一個地點發展安全而穩定的黏結關係。即使是遷移頻繁的游牧民族也會藉著同樣的家俱安排方式、帳篷的方位以及豎立帳篷所舉行的儀式以維持連續性 (Werner, Altman & Oxley, 1985)。對於習慣在空間中定居的人來說，住屋不像是日常用品可以來來去去。就像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所說：「房子是一輩子的事。」當政府告訴他們鑑定的結果是「目前安全無虞」的時候，他

們要問，什麼叫做目前，是一天、一個月還是一年？有的居民受迫於經濟的壓力，仍然住在原來的家裡，也有人暫時居住在建商提供的大樓區的房子。但是他們同樣遭遇的是對於住屋未來的不確定性。颱風或者地震再來的時候，林肯大郡會不會再發生災變？建商允許他們暫住大樓區到何時？有沒有集體遷村的可能？這種對於未來的不確定，導致住戶連基本的住屋維持都感到困惑。「我家很亂，已經沒心情整理。」「現在回到家裡都比較不喜歡整理，好像有沒有整理都無所謂。」「對我們家來說不安定真的是很不方便，以後要怎麼做，現在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安排比較好。」

民生別墅的居民也面臨相同的境況。在輻射鋼筋事件揭露的早期，居民對政府還存著相當的期待，對於社區理性的抗爭，也存著一絲希望。可是或拆、或搬，什麼時間可以有明確的答案，仍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而這種不確定性，讓居民無法去維持經營每日所生活的住居環境。「本來我們家也是想要弄（重新裝潢），後來乾脆不弄，乾脆亂七八糟的。反正我們也覺得這個地方到底要蓋還是要賣，我們現在也是看它們怎麼樣再處理。」

居民不確定還可以住多久或有其他轉變的可能，因此無法做決定到底要如何調整居家的環境，只好繼續住在一個不可預知的等待裡。民生別墅發現輻射鋼筋一年之後，「事情不會那麼快解決」造成某些住戶態度的轉變。因此有的家庭，還是毅然決然的換上新的家電用品、新的家俱。這意味著居民意識到期待輻射鋼筋污染問題獲得解決將會是一場長期的戰鬥。換上新的家電，並不表示他們對未來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想像與期待，而是對事情發展更失望的表現。

「我現在那個燈，廚房的那個水龍頭都換新的了。他們（鄰居）來，看了說：『房子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拆，妳換這些幹嘛？』我說，拆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我現在也是對這個不抱著什麼希望。」

災害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與脆弱有時會讓人失去計畫的能力（Edelstein, 1988）。實質環境的不確定、貸款繳交的不確定、抗爭與法律訴訟結果的不確定，也讓人很難規劃自己未來的人生。「妳根本沒有甚麼生涯規劃，一般人未來、有夢想，可以為自己規劃造就一個甚麼樣的生活環境。可是發生了事情，就中斷了，不敢奢望為自己做甚麼。」



災害與性別

根據民生別墅的訪談，當家庭面臨輻射傷害的威脅，男性往往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覺得身為一家之主，理應保護家人的安全，讓他們免於輻射的恐懼。社會對於男性家長的期待，讓他們必須撐起「堅強」的形象。尤其是面對家人陷於驚慌的時候，更要負擔起撫慰妻小的任務。一位先生形容：「太太晚上也就是緊張的睡不著，半夜醒來，那你身為一個男人要安慰她，沒事啊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面對輻射災害，男性對家庭的使命感及保護能力，被化約為經濟能力。是否有足夠的金錢讓全家搬離，暫時解除對輻射的恐懼，成為男性的責任。一位太太說：「他前半輩子的努力的成果，已經成了一個泡沫，不見了。你現在當作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當作我這房子已經沒有了，我重新去奮鬥。...他要創造他事業的第二春。」

相反地，擔心輻射污染是否對家人的身體及心理健康產生影響，是婦女最大的憂慮。家裡發現輻射之後，許多媽媽對於子女的健康狀況，採取更為謹慎小心的態度。有的媽媽會要求小孩子多做運動、吃維他命，期望身體可以更健康，體內有更多的抗體來對抗可能的病變。有的媽媽則特別重視小孩子的醫療過程，盡可能地安排就診。透過這些行動，讓這些做媽媽的覺得某種程度抒解了自己的壓力。

輻射鋼筋的訊息經媒體披露之後，一位女性住戶首先將自己在位於民生別墅對面大樓工作的地下室提供給住戶開會使用，她聯絡一些民生別墅的家庭主婦定期在地下室交換輻射相關訊息、商討維護身體健康的對策。然而隨著民生別墅自救會（由男性主導）的成立，居民開會的議題逐漸從健康轉向房屋求償。她雖然是租戶，但是身體健康受到相同的危害，然而她覺得開始受到會議的排擠，找不到發言的空間，因為是否拆除重建、房屋賠償，都與租戶無關。這雖然是房主與租戶之間關切利益的不一致，但是也反映了社區組織的性別差異。亦即居民聚集討論的過程，是由女性非正式聚會研商與身體健康有關的議題，轉而成為男性的正式組織，主要與政府討論房產的問題。而在自救組織中，男性住戶代表大都以民生別墅輻射鋼筋受災戶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公共媒體，發言內容大致與政府、法令、賠償有關。而女性代表卻較常以媽媽或家庭主婦的角色出現，訴說家庭生活與子女健康所受到的危害。

從林肯大郡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災害經驗的性別差異。在心理適應方面，男性傾向於壓抑其情緒，而女性則較善於表達。對於住屋危險的判斷，男性傾向於認為不會有事，而女性則深怕有萬一。至於是否抗爭的立場，男性比較認賠，而女性則要爭一個理。

林肯大郡發生災變的時候，根據三區與四區的女性受訪者表示，雖然當時自己居住的房屋結構並沒有受損，但是為了家人的安全，會選擇離開，然而男性對於危險的顧慮，其反應較常是「不會吧！」女性認為「如果走山根本來不及逃，可能只有幾秒鐘的時間。」男性則說：「唉！颱風，外面哪有比家裡安全。」不過當太太告訴先生：「好！沒關係，你不走，我自己帶著小孩子走。」「我老公看我很堅持，只好摸著鼻子乖乖的收拾東西。」

Anderson 與 Manuel (1994) 在有關地震對居民生活影響的研究中發現，男性在訪談的過程中，顯得較女性刻意壓抑自己的情緒，並刻意表現自己堅強的一面。林肯大郡的研究也可以看到災後心理情緒展現的性別差異。「可以感覺到牠（丈夫）那種灰心和難過這樣子，但我已經表現比他更難過了，他就表現得比我更堅強，他只好這樣子。」一位受訪者說，颱風以及地震過後，她先生都會在牆上裂痕的位置上貼上標籤，看看裂痕是否有拉長的趨勢。他可以注意這些細節，但是卻不太表達自己的情緒。「（災變）對他來講或許有點打擊，但是可能男人都愛面子吧，他都不會把它表現出來。」

災變過後，對於住戶是否要繳貸款、是否參與社區抗爭的看法，也顯現一些性別差異的現象。社會上仍然對男人存有賺錢養家者的角色期待，男人會理性地考量其經濟狀況，並且依其對於台灣政治的瞭解，認為抗爭曠日廢時且不會有結果。男性說：「不可能不繳！」否則會信用破產。女性說：「我一定跟它拒繳，我就是表達我的抗議！」至於為了緩繳貸款的事情參與抗爭，先生認為不但影響工作且會影響家庭生活，「如果一個月繳三萬多塊（貸款），那你可以讓全家人過得很快樂。」他太太則說：「他覺得值得，可是我覺得不合理，所以我就做不到。」先生認為應該認賠，覺得如果把精神花在這上面，乾脆努力重來吧。太太卻不甘心「為什麼明明不對的事情政府都要把它拗成對？」

女人在面臨災害的時候有很強的生命力，因為她們關心別人，即使這些人是陌生人 (Cox, 1998)。這三年來，林肯大郡參與抗爭的主力是女性，她們不只是參與傳統女性的工作，例如文書、製作道具、影印等，或者向媒體訴說生活的困境；在許多正式的場合，如立法院公聽會、與政府對談，這些

女性都還能夠對於山坡地安全、相關建築法令規定等侃侃而談。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性別現象。根據她們自己的說法：「女人天生就是比較放不下啦，會覺得說沒道理的事情為什麼硬拗我們，就是那一口氣拗不下去，那男孩子可能心胸比較豁達嘛！」「我要據理力爭。」

回到過去有關家的意義的研究，Hayward (1975) 發現女人較常將家視為自我認同的表達。對婦女而言，家的意義在於重要的社會關係；家同時也是一個個人化 (personalization) 的場所。而男人則較常將家視為一個物理空間 (physical space)。就這一點而言，表現在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災後經驗中，則展現女性關心住宅對家人健康的傷害，而男性則期待更努力工作賺錢以負擔住宅的費用 (包括貸款、房租或新購屋)。

結語

環境災害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於平日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提出一個新的認識，檢視過去未經反省、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態度；同時也讓我們對於災害本身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有所瞭解。亦即原來是日常生活中的背景 (ground)，因為災害的緣故，轉而變成是需要面對與反省的圖像 (figure)，例如家是安全的、購屋是人生所追求的理想等。

絕大多數人每天從家裡出發到外面工作或上學，然後又回到家裡。辛苦工作、成家立業後，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擁有一幢自有的住宅，以及隨之而來穩定安全的生活。環境災害引發人員的傷亡、財產的損失，讓我們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家的意義本身。從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中，可發現環境災害帶來的影響不僅僅只是財產的損失，更是家的意義的倒轉。伴隨而來的影響，則是家庭關係的重新組織與反省，以及對個人能力與工作價值的根本挑戰。

Cooper (1974) 認為住宅是自我的基本象徵，是人心理的延伸，人經由和住宅的親密關係，使得人能夠成長。Proshansky, Fabian 與 Kaminoff (1983) 指出實質環境也是建立自我認同的社會脈絡之一，地方認同做為自我認同的結構部分，以利於界定、維持和保護自我認同。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案例，顯示住宅的破壞，一方面讓人質疑自己的決策能力 (買錯住宅)、為家人提供安全生活環境的能力；另一方面，住宅本是一個安全、穩定、連續、具控制力的場所，現在卻變成一個危險的來源、一個居民想要逃離的空間。於是住宅原來所提供的民生、情感與社交活動的功能都無法正常運作，居民也因

而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加上危險的不確定、善後求償的不確定，更讓居民難以規劃自己以及家庭的未來。有的人對抗爭求償毫無信心，認為與其花時間在不確定結果的活動上，還不如更積極工作或開發事業第二春，以便在短時期的將來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家、或者乾脆移民遠離負債一切從零開始。有的人，則質疑辛勤工作去為一間不能住的房子付貸款的意義；尤其在九二一地震之後，有的人更覺得住宅不但不是追求的梦想，反而可能是負債，因而寧願「逐水草而居」，以免另一次災害讓住宅成為擺脫不掉的枷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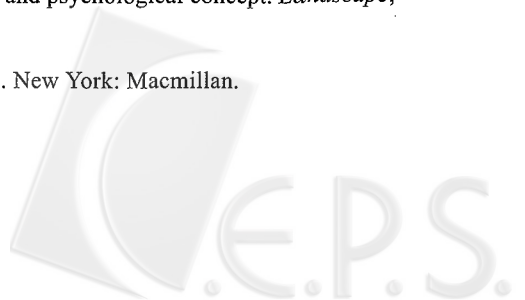
註釋

- (1) 謝謝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受訪者以及國科會對於民生別墅(NSC-83-0301-HI-002-006)與林肯大郡(NSC-88-2625-Z-002-045)研究案的經費補助。謝謝郭一勤與王淑芬協助民生別墅案；災害心理學修課同學鄭香辰、楊長苓、江菁頌、唐筱雯、馬士元、黃千秀、黃肇新、劉雅琪、歐宇帥、謝采秀等協助參與林肯大郡的研究與訪談工作。
- (2) 對於嚴重的住戶而言，每天所接受的輻射量相當於照射一張胸部 X 光。依據「原子能法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一般民眾接受人為輻射年劑量不得超過 0.1 侖目。所以嚴重污染戶其所接受之輻射量已經超過法定標準的數十倍，更何況依據輻射源的半衰期計算，八年前住戶進住民生別墅時其輻射強度約為此時的四倍。

參考文獻

- 王振寰 (1999)：〈地震之後：社會學界應積極籌畫投入災變研究〉。《台灣社會學社通訊》(台灣)，35 期，8-9。
- 佐藤妮娜 (1993.10)：〈台灣輻射島〉。《新國會》(台灣)，78-85。
- 畢恆達 (1990)：〈東西的意義與環境轉變〉。《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台灣)，5 期，41-56。
- 畢恆達 (1996)：〈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本土心理學研究》(台灣)，6 期，300-352。
- 畢恆達、郭一勤 (1999)：〈科技神話的夢魘：民生別墅住宅輻射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35 期，111-162。
- Amaturo, E., Costagliola, S., & Ragone, G.(1987). Furnishing and status attribut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living 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2), 228-249.

- Anderson, K. M. & Manuel, G.(1994).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ported stress response to the Loma Prieta earthquake. *Sex Role, 30(9/10)*, 725-733.
- Appleyard, D.(1979). Hom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1(3)*, 4-20.
- Bachelard, G.(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New York: Beacon Press.
- Baudrillard, J.(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 Bonnes, M., Giuliani, M. V., Amoni, F., & Bernard, Y.(1987). Cross-cultural rule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iving 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2)*, 204-227.
- Brown, B. B., & Perkins, D. D.(1992). Disruptions in place attachment. In I. Altman & S. M.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2*, 279-304. New York: Plenum Press.
- Chapin, F. S.(1935).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stitution*. New York: Harper.
- Cooper, C.(1974). The house as symbol of the self. In J. Lang, C. Burnette, W. Moleski, & D. Vachon (Eds.), *Designing for human behavior*.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130-146.
- Cox, H.(1998). Women in Bushfire territory.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London: Praeger, 133-142.
- Despres, C.(1992). The meaning and experience of home in shared housing. In Giuliani, M. V. (Ed.). *Home: Social, temporal, and spatial aspects*. San Giuliano Milanese, Italy: Progetto Finalizzato Edilizia, 53-66.
- Dovey, K.(1985). Home and homelessness,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New York: Plenum Press, 33-64.
- Duncan, J. S., & Duncan, N. G.(1976). Housing as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G. T. Moore & R. G. Golledge (Eds.), *Environmental knowing*.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247-253.
- Edelstein, M. R.(1988). *Contaminated communities: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offman, E.(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ayward, D. G.(1975). Home as an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 *Landscape, 20(1)*, 2-9.
- James, W.(1890).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Macmillan.



- Korosec-Serfaty, P. & Bolitt, D.(1986). Dwell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 329-344.
- Laumann, E. O. & House, J. S.(1970). Living room styl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e patterning of material artifacts in a modern urban communi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54, 321-342.
- Marc, D.(1977). *Psychology of the house* (J. Wood, Tr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McCracken, G.(1987). "Homeyness": *Culture made material in the modern northAmerican home*. Working paper No. 87-105. Guelph,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Guelph.
- Pratt, G.(1982). The house as an expression of social worlds. In J. S. Duncan (Ed.), *Housing and identit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35-180.
-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 Kaminoff, R.(1983).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 57-83.
- Saegert, S.(1985). The role of housing in the experience of dwelling.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New York: Plenum Press, 287-309.
- Seamon, D.(1979).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 Veblen, T.(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 Weisner, T. S. & Weibel, J. C.(1981). Home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s in California.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3, 417-460.
- Werner, C. M., Altman, I., & Oxley, D.(1985). Temporal aspects of homes: A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32.

初稿收件：2000年3月13日 二稿收件：2000年9月4日

審查通過：2000年9月8日 責任編輯：宋文里

作者簡介：

畢恆達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環境心理學）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通訊處：(106) 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電話：(02) 23638711 轉 42 傳真：(02) 23638127

E-mail：hdbih@ccms.ntu.edu.tw



The Meanings of Home in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Case Studies of Ming-Sen Building and Lincoln Community

Herng-Dar Bih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house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space for a person's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the sense of safety and control, reflects a person's value, and offers a person the sense of continuity and eternity.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how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create the upsetting of the concept of home for the residents. Using residential disasters in Ming-Sen Building and Lincoln Community as cases, we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not only cause the loss of assets but also create the inversion of the meanings of home. The home, which used to be a safe,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space, now becomes a source of danger, a place from which people want to escape. It also results in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flec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 person's ability and value system.

Keywords: environmental disaster, meanings of home, place attachment, self-identity, uncertainty